

社会环境之于外语教学与学习

沈 燕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 201701)

提 要: 社会环境是语言学习中不容忽视的因素。本文从社会环境对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的影响入手, 阐述社会环境在外语教学与学习中的作用, 并结合中国英语学习的现状, 分析中国学习英语者需要考虑的客观环境因素以及应该掌握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 社会环境; 语言环境; 外语学习; 学习机会; 学习动机

中图分类号: H3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5)03-0125-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3.025

The Effects of Social Context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hen Y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 Shanghai 201701, China)

Social context is an indispensable factor in language learning. This paper aims at elaborating on the roles which social context play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om both the objective and the subjective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glish learning in Chin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factor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in China and proposes measures to be taken in order to promote learning effects and efficiency in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social context;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earning opportunity; learning motivation

1 社会环境对外语教学的影响

在任何社会中, 外语教育的方针、政策, 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以及外语教学的方法、手段都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

1.1 社会环境与外语教学法的诞生

在欧洲, 拉丁语作为通用语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中世纪的欧洲, 拉丁语是文化教育、教会甚至政府和商业的通用语。从文艺复兴到 18 世纪, 欧洲大陆的政治发生巨大变化, 拉丁语的社会地位随之发生变化。当时, 欧洲的其他语言, 如德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当时交际的工具, 而拉丁语也从学校的教学语言变成一门课程, 主要用于阅读文献。语法学校的学生需接受拉丁语的严格训练, 如背诵语法条文, 学习词类变格和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 翻译和书写句子等。拉丁语的学习方法在欧洲根深蒂固, 乃至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几百年里, 欧洲的现代语言教学, 如法语教学和英语教学都沿用拉丁语的教授方法。这种方法注重系统地讲解语法、词形的变化和词类的变革等, 通常使用翻译作为语言教授的手段, 这就是外语教学中使用历史最长、最广泛的语法翻译法。

教学法的诞生是历史沿袭的产物, 更是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19 世纪, 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人们之间的往来。在交往中, 随着口头交际需要的增加, 欧洲人逐渐意识到语法翻译法在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听力理解能力方面的局限性。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些学者尝试对外语教学进行改革。这些尝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借鉴儿童学习母语的方法, 使用情景和不同的主题来进行口语教学。这就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普遍得到欧美国家官方肯定的直接法。

风靡一时的听说法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 美国对外出兵, 急须在短时间内培训出一大批具备外语听说能力的士兵。于是, 美国政府在 1942 年开设专门的军队训练课程, 以语法和句型结构作为外语教学的出发点, 以强化口头训练的方式来学习句子结构。学习者主要通过课堂上口头操练句型的方式来掌握句型结构。

一度被外语教学界奉为“万能教学法”的交际法则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当时的欧洲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都发展较快, 为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而成立欧洲共同体。为了消除欧洲共同体内各国之

间交往中的语言障碍,负责文化和教育合作的文化委员会在1971年组织专家探讨开设针对成人的外语教学课程。专家们通过研究成人在学习外语方面的需求,提出从功能和交际角度给语言下定义,并讨论制定出一个交际性语言教学大纲。随后,不少语言学专家发表各类论文和专著为交际法提供理论支撑。随着交际法课本的相继出现,交际教学法便建立起来。

1.2 外语教学法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正式的外语教学始于清朝的京师同文馆。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的门户被打开,对外交往需要懂得外国语言的人才。1861年1月,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写道:“查与外国交涉事情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安望其妥协”(朱有漱 1983:5)。另一方面,洋务派认为要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必须兴办洋务、借法自强、主张造炮船、建铁路、开矿源、兴办学校,以抗衡西方列强的人侵。奕欣等洋务派于1861年上奏道:“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朱有漱 1983:6)。为培养翻译人员以满足涉外事务之用,自1862年起,京师同文馆等一批官办外国语言文学学馆逐渐创立,学馆中的外语教学自然是重视翻译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也自然是采用语法翻译法。根据1876年京师同文馆的课程安排,学制8年,低年级课程主要以句法、翻译为主,高年级延伸到历史、地理、数学和机械等各个学科(朱有漱 1983:71)。在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外语教学都一直以语法和翻译为教学重点。其间,英语一度被停学,全民学习俄语。

从恢复高考到80年代末之前,“中国的外语人才奇缺,外语教师严重缺乏,全国高校中设立的英语专业数量有限,社会又急需口头和书面能力强外语人才,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文秋芳 2002:13)。因此,当时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英语人才,即能熟练运用英语从事听、说、读、写、译的活动,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较丰富的文化基础知识。所以4年的专业训练偏重语音、语法和翻译等基本语言技能的训练。相应地,课堂教学以听说法和语法翻译为主。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对外开放和高校毕业生双向选择分配制度对旧的教学模式下培养的外语人才产生了冲击,传统模式下培养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受到了市场的挑战”(文秋芳 2002:13)。改革开放后,对外交流增多,跨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旧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聋哑英语”不断受到社会病垢;除了听、说能力有待提高,社会要求外语人才还需要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以便更快更好地投入工作。当时的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修订说明中写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新的

要求,除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外,还需要大量的外语与其他有关学科——如外交、经贸、新闻、法律——结合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这种复合型外语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相应地,着重培养交际能力的交际法也在当时的英语课堂教学中流行起来。交际法因为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其中的任务型、内容型和项目型教学法更因其非常适合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培养而至今仍在学习界大受追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不断全球化,文化交流逐渐多元化,国际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知识更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社会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进一步增加。这要求外语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复合的知识结构,还要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较高的个人素质。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21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决定了21世纪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这些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也就是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知识的前提下,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掌握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2000:2)。随之而来,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以人文本”的建构主义教学法在课堂教学中悄然兴起。

可见,外语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确立,乃至课堂教学方法的选用是对特定时代、社会环境的反应,是行为主体根据客观环境,为解决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特定问题而相应采用的教育、教学措施。语言的客观环境不仅推动外语教育政策与教学模式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更替,有时也会限制其发展。以中国为例,从19世纪外语教学在中国开展以来,不断有西方先进的教学法进入中国,从最早教会学校使用的直接法到改革开放以后引进的听说法、交际法,再到现在先进的建构主义,有些如过眼云烟,有些在流行之后趋于平淡,而语法翻译法却在经历二百多年的外语教学史后,依然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各个阶段的英语教学中。被批评为机械、形而上、填鸭、不利于交际能力培养的语法翻译法在中国外语教学中屹立不倒,是中国外语学习的语言环境、现有外语教师的师资水平和现行考试制度的必然结果,甚至与中国学习者中庸内敛的性格、儒家尊师重道的教育理念和历史传承下来的重记忆轻实践的学习方法相关。

2 社会环境对外语学习的影响

社会环境对外语学习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

先,社会环境决定学习外语的语言环境,即决定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客观机会。其次,社会环境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态度和动力。(Spolsky 2000: 131-165)

2.1 社会环境之于外语学习的客观机会

接触目的语是学习外语的必要条件,外语学习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目的语接触的程度。这种接触不仅是时间上或数量上的,还包括质量上的。

首先,社会环境决定外语学习的客观环境。即学习者是在开放的自然环境中习得语言还是在封闭的课堂环境中学习语言;学习者接触的语言是来自于以目的语为母语的使用者的真实、正常的语言还是非目的语使用者简化后,有时还是不地道的语言;学习者是在有意义的交流中习得语言,还是通过阅读课本、分析语法、不断操练句型的方式学习语言。

其次,就外语的课堂教学而言,一个国家依据其国情而制定的外语教育方针、政策和人才培养模式决定这个国家外语学习者获得正规课堂教学的机会,如课堂教学的时间和数量。此外,社会需求也是影响外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因素,而不同的培养模式又决定外语教学中相应的教学方法的选择,乃至教材的选用。最重要的是,特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培养模式决定外语人才的培养质量,其中当然也包括外语教师的质量,进而又决定一个国家外语教学的总体师资水平。同时,外语教师的素质决定课堂教学的质量,乃至一个国家整体的外语教学质量,以至国民的整体外语水平。

具体来讲,就通过课堂学习的外语学习者而言,社会环境决定他们每天在学校上几节外语课、每节课多长时间、外语教师的水平、选用的教材和课堂教学使用的方法,甚至外语在他们整个学习与工作生涯的比重。

2.2 社会环境之于外语学习的态度和动机

根据Gardner(1979)提出的二语习得的“社会教育模式”,二语习得过程中的个体差异由4个变量决定:智力、语言学能、学习动机和情景焦虑。而学习者对于外语学习的价值观决定这4个变量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各自的重要性。其中学习动机和情景焦虑对非课堂教学的语言学习起决定作用。虽然课堂教学和非课堂学习都能提高语言能力,但是学习动机和情景焦虑决定语言学习者在课堂以外学习语言的机率。因此,这两个变量在语言学习中尤为重要。这里将探究一下社会环境与学习动机的关系。

根据“社会教育模式”,“学习动机有3个组成部分:对外语学习的态度、学习外语的愿望以及为之而付出的努力。学习者对外语学习的态度归纳为两类:综合态度和对语言学习环境的态度,其中综合态度是指对外界团体和外语的态度,对某种语言团体的态度和对语言学习的综合取向”(Gardner, Lalonde, Pierson 1983: 1-2)。此

外,Gardner还认为学习者对于所学外语的文化观会影响其外语学习的动机和学习态度,甚至学习态度在外语学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外语学习的效果也会影响学习态度,但就基本的因果关系来看,学习结果是学习态度和学学习动机的产物。学习态度影响学习动机,并间接影响学习效果。“学习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源自社会环境,而学习动机则是在特定学习环境中外语学习者采用的学习策略和学习行为。”(Spolsky 2000: 148)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学习外语总是出于某种目的,这些目的的重要程度决定学习者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程度。当这些目的仅限于个人需求时,所产生的学习动机为工具型动机;当学习语言的需求上升到社会范畴,成为社会关系的象征、社会交流的工具时,所产生的学习动机为综合型动机。在综合型学习动机下,学生的课堂反应更活跃,学习态度更积极,学习效果更好,语言学习更成功。综合型学习动机体现社会环境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即当语言学习上升为社会需求时,语言学习的效果更好。“而如果语言只是作为一种要求而被学,语言学习则很难成功。”(Ely 1986: 28-35)

Schumann的文化渗入模式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同样的问题“二语习得的结果与外语学习者获得的文化渗入成正比”(Schumann 1986: 379)。文化渗入是二语习得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主要成因,它能够阐释在非课堂教学环境下社会因素及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文化渗入有两类。第一类指外语学习者融入目的语社会,与目的语社会成员有充分的接触,并在心理上接受目的语社会,因而学习者所接收的语言输入能顺利地吸收。第二类除第一类的特征以外,学习者还在心理上把目的语社会成员作为参照,向往他们同样的生活方式。Schumann在阐释文化渗入的社会变量时指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成员(如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方面)没有学习从属地位社会成员语言的倾向”(Schumann 1986: 383)。此外,文化的相似度也会对二语习得产生影响,两种文化越相似就越有助于外语学习。

综上所述,影响外语学习态度的因素可以归纳为:第一,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通常情况下,选择学习某种外语或保存某种外来语取决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使用人数越多,其重要性就越凸显,学习者就越多。第二,该语言的地位。语言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地位对学习目标的确立、学习机会的获得和学习者的态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三,文化的相似度。两种文化越相似,互通性就越大,就越容易学习,学习者也越容易接受。

3 英语学习在中国

通常情况下,一种语言的重要性取决于该种语言使用者的数量及这些使用者对世界财富的占有比重。在国

际交流日益深化、双语现象日益普遍的今天,一种语言的使用者不能只局限于母语者,还应包括以该语言为第二语言的使用者。而对于外语学习而言,学习者对某种外语的态度,除考虑语言的重要性外,还受到该外语与学习者的母语之间相似度的影响。

3.1 英语的地位

英语是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公认的国际语言。虽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数量要远远少于汉语,但是前者占有世界经济的生产总值要比后者多近百分之十。(Davis 2004) 此外,如果把第二语言使用者也考虑在内,两者的数量几乎相当。不仅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以英语为二语的人口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并呈低龄化趋势发展”(Graddol 2006: 62)。除了作为第二语言之外,英语已经成为很多跨国公司的工作语言,尤其在计算机和通信等先进领域中,因此随着这些先进产业及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其使用必然更加普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教育也逐渐步入全球化,而英语在这一进程中又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世界顶尖大学大多在英语国家是英语成为校园语言的更重要的原因。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每年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世界顶尖的100所大学中有近三分之二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因此,英语成为获得优质教育所必需的语言。

3.2 英语在中国的现状

Kachru(2004)估计1995年中国大约有2亿英语使用者,随着中国各项推进英语学习政策的实施,每年大约新增2千万使用者。照这样推算,2014年中国大约有4亿英语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暂且不讨论这一数字的准确性,考虑到中国的单语种特性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三分之一的使用者应该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发达地区的跨国公司及各地区的学校中。因此,英语在中国的分布和使用范围仍然相当有限。而这门在日常生活中实际用途相当有限的语言却是贯穿正规教育全过程的必学科目,是中国目前各类升学、升职的必考科目,是谋得一份好工作的必备工具。没有语言环境和实际生活用途使得学习者缺少积极的学习动机,但却又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因此,英语学习给国人带来无尽的煎熬。然而中国英语教育最大的尴尬在于,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国人总体的英语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是真正能够满足工作需要的英语人才并不多,国际化人才更是寥寥无几。“英语专业甚至连续几年成为就业率低、失业率高的‘红牌专业’。”(杨东英 秦雪峰 2013: 42)

3.3 对英语学习的几点建议

长久以来,中国的英语学习一直面临着事倍功半的困扰。这既有客观原因的限制,也有主观因素的干扰。要提高英语学习的质量和效率,首先要从客观现实出发,

用理性的态度对待英语学习,选择更符合国情、更科学的学习方法。

在母语的环境中学习外语,缺少真实的语言环境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学习者不得不依赖教材,依靠课堂学习。教材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手段,因此教材的选择应该以教学目标为出发点。以普及英语为目的、面向以提高交流能力为目标的初级学习者的教材应贴近生活、实用性强,因此以情景法编写的教材就比较适用。而对于有升学需求,以提高专业水平为目标的中、高级学习者,以内容型及项目型教学而编写的教材融语言及专业知识于一体,更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教材是辅助教学的手段,教材的选择必须为教学目的和教学对象服务。

教学方法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受制于语言环境和学习环境,目前绝大多数中国英语教师,无法像母语使用者那样驾轻就熟地使用英语。因此,那些对英语表达能力要求较高,以纯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方法,如交际法,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英语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应以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为出发点,并兼顾现实可行性。语法翻译法自然是在中国学习英语语法和翻译最有效率的方法,听说法最适合听力和语法、句型结构的强化等以提高熟练度为目的的语言训练。对于初学者来说,情景法和直接法比较适用于具体而实用性强的授课内容。而对于已经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且专业要求较高的中、高级学习者来说,任务型、项目型和内容型的教学法可使英语学习事半功倍。

语言学习并不是简单的模仿,通过模仿无法真正学会一门语言。这不仅是因为在理论上中介语只能无限接近目的语,而不可能变成目的语,更是因为事实上语言本身也与时俱进,具有创造性,在不断变化中。因此,大众学习者大可不必刻板地模仿英美人的“字正腔圆”。学习外语,交流才是最主要的目的。英语有很多变体,如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等。这些变体不尽相同,有的在发音上甚至相去甚远,但是没有人质疑它们是同一种语言,而且这些变体之间也能很好地实现相互交流的功能。因此,缺少语言环境并不能成为普及一门语言的主要障碍,中国在普及英语方面可以借鉴印度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经验。

要提高一门语言的普及程度,仅靠课堂教学远远不够。一门语言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应该积极创造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使用这门语言的机会,提高语言使用的频率,创造更多语言习得的机会,激发人们对语言的需求,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普及。在中国,学习英语缺少自然语言环境,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英语的实际需求有限,远远没有上升到社会需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不如新加坡和印度的学生、大陆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不如香港学生、内地学生不

如沿海开放地区的学生。因此,我们在普及英语方面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如英语节目、英语电台和英语频道等,都是很好的推广英语和提高英语水平的渠道。

当前,英语学习在中国最大的尴尬是它给国人带来的精神负担。其实,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大部分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共有的现象。“那些把英语作为升学、晋升条件的国家并未大幅度地提高国民的英语水平,却给学习者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Graddol 2006: 84) 中国人花大量时间学习英语,主要原因是作为一种要求被动的学习,为学而学,为考而学,缺少语言环境,缺乏学习动力,以至于大多数人在通过考试或离开学校后,无论当时学得好与不好,都不会再接触英语。不仅如此,英语考试如今成为升学、升职的“拦路虎”,英语学习让人们陷入一个“不想学,还要拼命学”的怪圈。随着压力、负担而来的是抱怨、批评,甚至是抵制。被迫的学习终将对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要使英语学习能在中国健康地展开,让人们用理性的态度对待英语学习,不合理的考核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把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习者,决策部门要尽可能地为英语学习提供丰富的学习平台,激发大众的学习兴趣,鼓励有兴趣和语言天赋的学习者,培养专才和尖才。一刀切地动用国家和社会资源开展强制性学习既打压大众的学习热情,压制人才的发展机会,也浪费社会资源。

4 结束语

从使用人数、社会功能和国际地位的角度看,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存在、发展并壮大的趋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改变。因此,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人学英语仍将是长期、必然的趋势。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外语教学改革。2017年起,英语不再参加统一高考,改为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三年多考。各高校将根据各自的专业需求对英语提出相应的等级要求选拔学生。这并不意味着英语不重要、将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是以一种更理性、更科学、更符合国情的方式来对待英语学习,有利于学习者展现真实的英语水平,更

有利于英语学习长期、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文秋芳. 英语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和实践[J]. 国外外语教学, 2002(4).
- 杨东英, 秦学峰. 英语专业本科就业情况与课程设置改革[J].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 2013(5).
- 朱有漱.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 Davis, M. *GDP by Language* [DB/OL]. <http://www.uni-code.org/notes/tn13/tn13-1.html>, 2004.
- Ely, C. M.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A Descriptive and Casual Analysis [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6(70).
- Gardner, R. C., Social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In: Giles, H., St Clair, R. N. (Eds.),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9.
- Gardner, R. C., Lalonde, R. N., Pierson, R. The Socio-educational Model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vestigation Using LISREL Casual Modeling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2).
- Graddol, D. *English Next* [M]. London: The English Company (UK) Ltd, 2006.
- Kachru, B. *Asian Englishes: Beyond the Canon*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chumann, J. H. Research on the Acculturation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986(7).
- Spolsky, B. *Condi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收稿日期: 2014-05-11

【责任编辑 谢 群】